

《小城镇 大问题》与当前的 城镇化发展

沈关宝

提要:在当前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回顾总结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中国小城镇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费先生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和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提出乡村工业化及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志在富民”为根本目标,探索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进程;二是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探索优先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三是以经济的体系化良性运行为核心,探索区域经济共同体合理布局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农工相辅 乡村工业化 小城镇发展 区域经济共同体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依据我国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这一主要矛盾,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将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推动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同时,促进新农村建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013)。时隔一月,党中央又举行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把三中全会决定的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置于六大任务之首;会议明确指出在有序实现市民化过程中让广大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人民日报社,2013)。

在这两个历史性决定提出之际,恰逢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小城镇 大问题》^①一文发表30周年。费先生的这篇论文开启了他

① 1983年5月2日,费孝通先生带领我们调查组到江村作第6次访问,前后花了1个多月时间,集中调研了吴江10多个小城镇的历史、现状。在此基础上,费先生于1983年9月21日在南京召开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做了“小城镇 大问题”的发言,笔者随即整理了先生的这一发言稿,并经先生审阅订正。翌年9月,费先生在《瞭望》杂志发表了《小城镇 大问题》这篇调研报告。1983年10月3-8日,费先生第七次访问江村,后来整理成《小城镇再探索》一文,发表于《新华日报》1984年5月2日第四版。

长达 10 余年的小城镇研究,在学界反响巨大,并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① 费先生在文中阐述的乡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化的主题,以及在随后研究中以区域经济名义展开的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以及农村的协调一致和组团式发展等思想,不仅在当时将小城镇问题推向中国农村改革的前沿、对当前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推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学术自觉亦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贡献。本文仅以笔者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在费先生指导下随他从事乡村工业化及小城镇研究的经历和一己之见,概观费先生的小城镇研究的思想和学术脉络,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以“志在富民”为根本目标,探索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进程;二是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探索优先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三是以经济的体系化良性运行为核心,探索区域经济共同体合理布局的发展模式。

一、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

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如何在拥有庞大农业人口的中国实现现代化?这显然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费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主张工业下乡,走与欧美工业化不同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道路。而这主张源自他对其田野工作点——江村的考察。

江村是一个地处太湖流域,自古被人誉为“人间天堂”的地方。但那里的人们很早就面对人多地少的矛盾,并采用男耕女织、农工相辅的方式来创造富足有余的生活。然而到了费先生做调查的 20 世纪 30 年代,斗转星移,“天堂”好景不再。那时有两大致命因素彻底地摧毁了农耕与家庭手工业的基础:其一是人口增长条件下的土地兼并,致使“牛郎”无自己的土地可耕;其二是在全球市场影响下的土丝价格骤降,致使“织女”的收入锐减。这两大因素叠加的结果自然是

^① 《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于 1983 年发表后,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作出如下批示:“发展小城镇这件事我们党内许多同志还没有接触过,我也是蜻蜓点水,因此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更不可能拿出一套正确的措施。既然拿不出,就不必急忙做决策,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推行。凡属不成熟的事硬着头皮去干,事情必然成不了功。我在这方面吃苦头是很多的。但这本小册子是值得一看的。文字将近四万,太长了一点,但是好看。费老毕竟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而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1983 年 11 月 5 日。”

经济的凋敝。

家乡的衰落激起年轻费孝通消除农民饥饿和乡村贫困的使命感。而想要摆脱乡村的贫困,除了改革土地制度,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利用农工相辅的传统,即以现代工业技术来激活家庭手工业,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必须指出,费先生的这一主张并非只是他的一种空想。因为那时有一批主张实业救国的先驱者正在江村进行改进缫丝技术的实验。后来尽管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这一实验宣告失败,但费先生深信:中华民族终将在战争中获胜,并终将会战后的废墟上实现乡村工业化(费孝通,2013:13-16)。

新中国建立之初,土地改革使处于崩溃边缘的乡村经济得以缓解,而分得土地之后农民的劳动热情又使耕地的产量有所提升。然而,当费先生1957年重访江村时,听到的却是农民们对缺钱花的抱怨。费先生调查发现,尽管农民家里有较为充足的口粮,但农工相辅的传统在集体化的“大家”里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因当时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而使农户的副业受到全面限制。在此情况下,费先生在研究报告中重提他工业下乡的主张(费孝通,1999,第七卷:57)。不幸的是,费先生因此而蒙难,受到长达28年的不公正对待。直到1979年,他才重获自由,回到学术舞台。

自1980年起,复出后的费先生一次次地频繁访问江村,并从江村到吴江,再到江浙两省,调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因为在那一时期,后来被邓小平称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正在这一带兴起并蓬勃发展。看到自己在青年时代的“工业下乡”构想正在变为亿万民众的实践,费先生欣喜不已。但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费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引导这场变革到达理想的彼岸,必须把这场大变革的道理讲清楚。于是,他紧跟实践步伐,提炼总结民众的创造,形成了许多关于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的理论见解。

首先,费先生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作出归纳,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和以工补农”(费孝通,1988:135)。“无工不富”是从苏南模式获得的认识,即乡镇工业通过吸收乡村剩余劳力从事工业生产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无商不活”是温州模式创造的经验。当年,通过号称10万的供销员在全国各地开拓市场并与当地的家庭企业联结起来,不仅使原来贫弱的温州农村跟苏南一样迅速致富,而且因其更彻底的市场驱动而更具活力。而“无农不稳”和“以工补农”则多少表

达了费先生对乡镇工业的期望。他认为,一方面,如果缺少农业现代化的配合,乡镇工业将会独木难支,只有农业的进步才能维持现代化的稳定;另一方面,从农业和农村脱胎的乡镇企业自然不会遗忘自己的老传统,滋养和反哺农业并以此来巩固自身。

其次是关于乡镇企业的性质与发展前景的探讨。尽管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存在诸多的差异,但费先生认为两者都是依据市场机制而运行的民营企业。因而,它们共同具有的商品经济性质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费孝通,1999,第十卷:459-468)。

最后是农村城市化的问题。农村城市化似乎应当是乡村工业化的逻辑展开,即原先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村,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在形式上和本质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变化的结果是以往的城乡区别和城乡对立的消亡而出现城乡一体化。这尽管是一个十分长期的过程,但费先生认为,乡村工业化已经催生了城乡一体化的萌芽(费孝通,1999:229)。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费先生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思想,不仅为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有序展开和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作出了他作为一名“人民社会学家”(阿古什,1985:109)应有的贡献。

二、优先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

小城镇为什么是个大问题呢?费先生在新世纪初对小城镇研究作总结时说:“我在过去20年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时,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关注小城镇的发展建设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是一个从‘乡土中国’向现代化都市逐步发展的过程。鉴于中国的历史、人口、城镇规模、发展速度等因素和条件,我们不得不走从农村小城镇开始,逐步发展城市化的过程,必须自下而上地发展起多层次的犹如金字塔型的经济中心,以此来最大限度减低高速现代化和都市化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和震荡,保证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平稳进行”(费孝通,2004,第十六卷:37)。

在中国的巨型社会变迁中,核心问题应当是产业的转型和人口的就业。产业的转型或许是费先生所谓的“经济账”,而人口的就业就不

仅仅是经济账,而是包括体制、人的观念和态度在内的经济、社会综合效益。因此,从综合效益上来看待小城镇发展,就要把关注农民生活作为城镇化的核心(费孝通,1999:199;见巴博德,1999)。

除此之外,在费先生的小城镇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强调小城镇人口截留的兴衰史和关注城乡经济联系的层次说。

所谓兴衰史,是指费先生在研究中发现,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分界,吴江的小城镇走过一条先衰落、后复苏的道路。费先生正确指出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功能趋于单一化,导致非行政中心的城镇因人口流失而日渐衰落;而此后则由于乡镇企业的兴起导致小城镇的普遍繁荣。

在城镇繁荣的背后,费先生注重的是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那时的苏南,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小城镇落户,而且企业的数量、规模不断扩大。与此相应,越来越多的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进镇做工,并从最初亦工亦农的兼业状态逐步向全职的企业职工过渡。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小城镇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复苏,在镇上活动的非户籍人口急剧攀升。以著名的江南丝绸古镇盛泽为例,在短短的4、5年内,人口总量就突破10万,几乎翻了一番。费先生用“离土不离乡”来形容那些白天进小城镇工作、晚上返回农村生活的乡镇企业职工。他还把“离土不离乡”作为“苏南模式”的一个特点,与欧美工业化初期的城市化进行比较。西方的城市化是在乡村居民大多举家迁入城镇的过程中实现的(江立华,2002;麦夷、江美球,1988),而中国的城市化却从劳动力的只身进城起步,劳动大军每天或者定期在城乡之间如同钟摆一般地来回流动。因此,他又称这部分劳动力为“摆动人口”(费孝通,1985:51)。“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摆动”进城,在费先生看来只是中国城市化阶段性的过渡现象,他曾形象的将其比喻为蜕变中的青蛙,身后还拖着一条尾巴。然而,正是这种貌似不伦不类的城市化,却在经济和人口两个方面使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摆脱了大震荡的冲击困境。

从经济上看,我们不难获得中国的工业化是以密集的劳动力去替代资本快速积累而兴起的结论。而所有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工业化转型的瓶颈问题几乎是雷同的,那就是资本的稀缺和快速积累。这也是我国改开后,各级政府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的一个主要诱因。这种资本匮乏的状况对于民间的乡镇企业而言尤为严重。于是,苏南民众的

创举之一就是因陋就简,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部分弥补资本的不足。现在看来正是这种先替代后积累的办法,使我国的工业化转型走出了资本短缺的发展困境。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其间,人口红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此过程中,由于大多数乡镇企业职工生活在农村,大大减轻了企业在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投入,从而使早期的快速高积累成为可能。

从人口上看,这种方式既有当时大中城市发展的不充分、无法吸纳大量农村人口进城的无奈,又是城市化分阶段推进、人口逐级进城的必然。对此,费先生还用“人口蓄水池”来形容小城镇的人口截留作用。他期望全国约 3000 个县治镇和约 5 万个小城镇都能像东部沿海地区那样发展起来,如果每个镇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地吸纳乡村人口的话,那将能在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总之,费先生希望用这种方式使大中城市免于过早受到乡村人口的冲击,赢得足够时间去扩充自己的容量。然而,农民工进入大中城市的洪流还是超出了研究者的预想。进入 21 世纪后,面对数亿计的流动人口,费先生一再呼吁要充分关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现象,尤其要重视“农民离乡后的活路”,即农民的就业。同时,他还要求研究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过程及其对于乡村的作用。

小城镇的层次说是费先生关注城乡之间经济联系而提出来的。从江村航船进镇为农户销售农产品和购买日用品的观察中,费先生意识到,在每个乡村农民的生活里有更高一层社区,即小城镇在发挥重要作用。小城镇作为商品的集散中心,它的商品流通与农村的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强弱,则取决于小城镇的层次高低。以往划分小城镇层次的办法,往往是以人口数量的多少为标准,这固然便利有效,但费先生认为小城镇层次分析还得顾及民间的流行说法——“乡脚”,对此,费先生用买铝锅的例子加以说明。他说,无论是江村的商店还是庙港、七都等乡镇,都有铝锅出售,但该地区的农民认为,到离他们较远的震泽镇去购买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而买一般的食品,农民则往往采取就近购买原则。据此,可以看到每个小城镇都有它的商品销售范围,即俗称的“乡脚”。当然,“乡脚”并不是以镇为中心的清晰圆周,每一种商品都有各自的“乡脚”,故每个小城镇的“乡脚”由许多半径不同的同心圆组成,小城镇层次的划分实际上决定于它们“乡脚”的大小(费孝通,1985:39-41)。

费先生还主张,小城镇的层次分析应当深入到满足农民生活需要的功利评估,即农民对买何种商品、花多少时间、付多少成本的计算和均衡。功利评估的原则是以最少时间、最低成本去获得最满意的商品。这意味着小城镇乃至大中小城市的商业应当依据这样的研究结果去进行合理布局。

由此可见,费先生眼中的小城镇,就是星罗棋布、大小不一的乡村生活的中心。这些中心可以有类型的不同,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流通等等;也可以有各种类型的综合,成为多功能的农村中心,甚至向小城市、中等城市发展。显然,今天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费先生关于中心与“乡脚”互为前提的观点,全国已有相当数量的中小城市是在原先的小城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三、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作为小城镇研究的自然延伸,区域经济成为费先生重点考察的一个方向。对此费先生曾在《区域经济浅谈》一文中尝试如下定义:“是否可以这么说,人们在一定的地区里,由于经济的活动,聚集和连接在一起,互相协作,形成一个经济区域,在这个区域里的经济活动就是区域经济”(费孝通,1999:364)。

在我的印象中,费先生的学术研究很少从概念和定义出发,而更多的是从实际问题出发。记得1985年夏,费先生在甘肃调研时听到三个问题:一是甘南藏民的牲畜存栏数因高寒气候而难有突破,即当年产下的幼崽因来不及长膘而在冬季大批死亡;二是汉民圈养的牲畜有幼畜来源的限制和成畜上市无门的难处;三是回民虽有高超的肉类加工技艺和远销我国西部邻国的渠道,但常常苦于缺乏优良的原料。费先生听后提出建议说,能否在各民族间搞一个联动项目,把藏民生产、汉民圈养和回民加工三者结合起来,达成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区域经济格局。

此后,我国的经济开始起飞,类似于上述区域经济的呼声日盛,但常常受到行政区划的掣肘。对此,费先生认为首先应扩大眼界,提高对区域性经济共同体走势的认识。他注意到20世纪后期,全球出现的跨国家的经济共同体的现象和理论。例如欧共体的密切协作与共同规划,又如北美、中美各国在部分领域内的联合协作等等。同时,我国伴随着改

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走上了城乡一体化的道路。市场经济的成长,已使过去因行政区域而分割的经济关系,转变到有协作、互补和超越行政区域的需求的关系(费孝通,1999:220-221)。

在此认识基础上,费先生开始实地研究城市化中各级各类城镇对其周边区域的牵引、辐射等问题。他首先考虑到的是长江流域的发展和上海的定位问题,提出是搞深圳式的上海还是建设香港式的上海的问题。费先生深入分析了上海的传统,特别是曾经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那段历史,随后建议上海应当成为长江流域的贸易、金融、信息、科技和运输中心。他说:“换句话说,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的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方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间的宏观设想”(费孝通,1999:212)。

从此以后,费先生对于区域经济的构想热情一发而不可收。从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较小范围的区域发展,到东北图门江口地区的发展战略,再到环渤海湾经济区,直至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他都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而他所做的这一切,仍与小城镇研究的根本目标完全一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相信总有一天能看到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具有实力的统一体,矫健的踏进全球一体的大社会。我也愿意为这篇大文章的写作付出我最后的一段生命”(费孝通,1999:221-222)。

行文至此,不难看出,费先生城镇化思想的轮廓其实在60多年前早已形成。如费先生在1984年4月8日给笔者的来信中就要求我循着“江村—震泽—吴江—苏州—上海经济区江苏部分—上海经济区”(工业化进程)、“农村—集镇—小城市(城镇)—中城市(苏州)—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城市化进程),以及“从乡土社会到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社会转型)的三条主线做好研究规划。他在信中还特别指出:“每条线包含着从基层细胞家庭起分血缘、地缘、业缘分别扩张而形成层层的结构,各缘由又交错重叠,构成各种模式。我们要大题小做,用具体的事实,生动活泼地有血有肉地把这大网络表现出来。这是一生的事业,要煞费匠心,吃苦耐劳地经营创造”。^①

① 限于篇幅,恕此未能附上此信原件,感兴趣的读者可与《三亚学院学报》编辑部联系:syxyxb2009@163.com;参见沈关宝,2013。

参考文献:

- 阿古什·戴维,1985,《费孝通传》,北京:时事出版社。
- 巴博德,1999,《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 费孝通,1983,《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1985,《小城镇四记》,北京:新华出版社。
- ,1986,《论小城镇及其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1987,《沿海六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1988,《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9,《费孝通文集》第八卷、第九卷、第十卷、第十一卷、第十三卷、第十六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 ,2013,《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黄维岳、王柏森、庞殿勋、李承邵编,1985,《小城镇建设探讨》,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 江立华,2002,《英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 李开鼎,2010,《大师费孝通——读〈费孝通文集〉札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 李铁,2013,《城市化是一次全面的社会变革》,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 林家彬、王大伟等,2012,《城市病——中国城市病的制度性根源与对策研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 马西恒、鲍勃·谢比伯等,2006,《中加社区治理模式比较研究:以上海和温哥华为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麦夷、江美球,1988,《城市社会学概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 人民日报社,2013,《积极稳妥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人民日报》12月15日。
- 沈关宝,2007,《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 ,2013,《三亚学院学报》(内部资料)第1期。
- 乌恩怀特,威廉,2011,《社会的未来》,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0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三亚学院、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张宛丽

MONOGRAPHIC STUDY

New Urbanization and New Family Planning Policy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Small Towns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Shen Guanbao* 1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 there i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view the classical research on small towns and urbanization made by the famous sociologist Fei Xiaotong. First of all, based o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nd systematical analysis, Fei proposed the route of industrializing the rural regions, which took into account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large population with few land, and the tradition of integrating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sectors in China. In addition, Fei not only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ownship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rural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the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small towns, but also put great emphasis on the key functions of small towns. Finally, Fei suggested that the economic community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economy) of different regions ranging from agricultural regions, small towns to large,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beyond the limit of administrative areas. This trend of regional economical cooperation resulted not only fro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ut also from the deman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improvement of Chinese society.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2010 population census data *Guo Zhigang* 10

Abstract: In China,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the past 30 year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distinctive trait of age selectivity. By showing the current population pyramids of the usual residents in the three metropolitans of Beijing, Tianjin and Shanghai, and those in urban areas of the countr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severe dependence behi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urban areas